



第十章

重庆铜梁旧市坝

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想要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环境如同巨流，不仅仅是年轻人，即使像我父亲那样的成年、中年人，也都只能在巨流中翻滚，巨流里满是漩涡，被漩涡卷着，我最后还是成了职业军人。仅仅一年以前，我还允诺赵双桢成为工程师报效国家的！

我和王福成一块由西安乘军用飞机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又领了路费到铜梁县旧市坝入伍，凡是那一时期进入空军学校的，都在这儿受过洗礼。重庆附近大都是丘陵地形，凡是有一块较大平地的都叫「坝子」，常常成为乡镇或市场。旧市坝亦如此，中间的平地做为操场，围着平地几幢具四川特色的四合院，分别进驻每一「队」，只有第七、第八两队是在操场西边的草屋建筑里。不知怎样，我们政府总是舍不得盖象样一点的房子给军人住，不是征用民宅，就是搭草顶的临时建筑。

我们的正式称号是：「空军入伍生总队」，最高领导是「总队长」，总队长后来还到了台湾。每一队有「中队长」，我是机械第九期，在第七中队，王福成被编入另一中队，到成都以后，听通信学校的同学辗转通知，知道王福成病死，算是不幸而早夭，他绝对是个满腔热血

的陕西汉子。我们的入伍生总队分驻在各营房，没有正式的大门，且，有一条大约可容一辆大卡车通过的路跨越营区。当年规画旧市埧营区的人，在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埧的营区范围前竖立了两根柱子，分别刻着：

民族复兴路

空官第一关

同学们纷纷立在柱前拍照留念。很显然这十个字有两种意义，第一，要想成为空军男儿，此处是第一个考验，结训完毕时，还有不幸被淘汰的同学。第二，想要让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必先要发展空军，没有空军，国家怎能不被欺凌？八年抗战时，日本飞机可以轰炸我们重庆，西安，宝鸡和其它各大城市，我们几曾轰炸过日本的东京，大阪？然则，把国家这样重大的基础建设，竟然如是简陋的规画。或许他们会说，回到杭州笕桥才是我们真正的培育空军基地，这儿，只能说是「逃难」罢了，也算对。

在我们操场的南边有一条小溪，下午出操完毕，便脱个净光跳入小溪中洗澡。小溪再过去，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巴山了，「巴山夜雨涨秋池」应即指此山，山，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常常在队长的率领下，沿着曲曲长长的石阶登上山去，沿途路旁有不少水池呈灰白色，去的次数多了，我知道里面浸泡的是竹子，待竹子被石灰等化学物质浸透，

浸软，让竹子的纤维分离出来，便可以用为造纸原料，造成的纸叫做「火纸」，乃吸水烟袋不可少的。用火纸搓成的纸卷，自燃很慢，用嘴轻轻一吹，便成火焰，等于现在的「打火机」。五十岁以后，我也抽烟斗，烟丝，在买到可扭转式的打火机以前，常常想到四川的火纸，火纸可以从各角度点烟斗，且没有火柴刚刚画燃时的磷味儿。

我们登山时，常常看见从山顶下来的挑夫，这是川、云、贵一带特有的行业，他们头顶盘着白头巾，穿蓝布大挂，前摆掀起来别在腰间的宽布腰带间，足下跟我们一样穿着草鞋。他们用一条看来软软有弹性的竹制扁担，两端挑着体积很大，不是很重的火纸下山。扁担会随着下山的脚步一闪一闪地，想来，这是一个积累经验而成的节省力气的方法。

不知道多少年后，我看了丰子恺(1898-1975)的一幅水墨漫画，画中简洁的一阶一阶重庆式的丘陵石径，只有一位挑夫，彷彿也是挑着类似火纸那样体积很大的重物，挑夫孤独地行走在寂寞古道中，画纸上题了七个字：

一肩挑尽古今愁

我曾经对那幅画凝视了很久，此事应是发生在台湾，且是到了台湾多年以后，又是大陆探亲开放多年以前，那画，竟然触动了我的乡愁，想到了旧市坝，又想到了宝鸡凤翔，还想到了离别父亲时，父亲

的眼泪。

入伍训练的内容乏善可陈。约为三、四个月后，民国三十五年年初，我再次遇见了她，你为什么还要问她是谁？我不是说过我已经和她见过三次面了吗？我和同学张春翔一同被选为我们队上的「中山室委员」，任务是领了公费到铜梁县城去采购文康书报，那得走很远的路，中午用误餐费吃饭，晚餐前赶回队部。张春翔也很有趣，他父亲在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附近开一家杂货店，学生和老师们是他父亲的基本客户，且，他自己也决定民国三十三年高中毕业后要考音乐学院的，没想到三十三年初就被炸了，日本飞机主要目标是音乐学院，没想到炸偏了，整个铺子遭殃。他乃考了空军，想必是要驾飞机到日本把冤仇报回来，大约和我一样身体检查没有通过才改学机械的。他从空军机校毕业后分发上海江湾机场，到台湾不久就申请退役，约为民国五十九年，张春翔已经是三重一家农具生产工厂的老板，此是后话。

那时，我们一块走路到铜梁，他仍一口四川乡音，也很直率。有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轱过，他会一直盯着车子看，一直到车子转了弯不见踪影，他才用四川乡音赞叹说：「洋马儿跑地好快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张春翔很随和，买什么书都由我说了算，钱有限，也没买到什么象样的书，倒是报纸，说是要给队上订一份日报。那时好像有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但我一眼就看中了头版上登着一幅陌生照片的「新

华日报」，照片上的是毛泽东，张春翔说订这个报纸不好吧？我说可以啦。我们就订了一份，后来知道那是在大后方唯一的共产党机关报。想来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委员长讨论中国战后的重建问题吧，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是在讨论如何分赃的问题才对。做为胜利国，敌人除了扫地回他们自己老窝之外，留下来的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国民政府对这事有一个专门用语：「接收」，负责这种工作的人称为：「接收大员」，个个都是肥缺。老共那方面怎么称呼不得而知。

从铜梁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远多了，我们找到路边一处小山坡上，斜躺着晒太阳，重庆冬日的阳光真舒服，自小生活在北方的我，几乎要被那可爱的阳光熏醉了。就在蒙眬的片刻，她飘然出现，她长大了些，可她的双眸仍有童稚的纯真，她对我露齿而笑地说：

「那人，你喜欢吗？」

我们之间似乎有那种被称为「灵犀」的默契，我立即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人，因而立即回答说：「我喜欢，一看就喜欢了。他慈悲宽厚，他会爱护我们的人民，把大人小孩带到天天过年的美好世界去。」

「你说对了！」她又飘然而去。

如果我现在接着说，我跟她算是有缘份，可是，我跟她的缘份不如我跟美国的多。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什么对什么呀？未免扯得太离谱了吧？一个是人，一个是国家，什么缘份不缘份的？其实没有扯太

远，因为我的第一份职业——气象员就是因美国而获得的。

我原本入伍训练之初，是空军机校第九期正科学生，入伍训练之后会到成都的空军机校继续学业，这话应提早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号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变说起，珍珠港事变最少最少也改变了我的第一个职业，由空军机械员变成空军气象员。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不愿意蹚中日战争这浑水，可是之后不得和日本宣战，也不得不帮助岌岌可危的中国。并派了「空军志愿军」，其实都是职业的空军飞行员到中国来，这就是后来的「飞虎航空队」。他们到了昆明，发现中国的所谓「空军」，只有几架苏联援助的旧飞机，要命的是各地区的天气报告都不全，不知道目的地的天气，让飞机如何飞。我们的空军当局，那时尚未成「军」，只称为航空委员会，乃急起直追，立即在当时的昆明军官学校拨出一部份学生加以六个月的快速训练，即派往各地督导气候测报工作，不要求他们「预测」天气，只求按时、准时地把当地天气现况报告出来即行，此即我们气象第一期的学长，我，则是第八期，且专业训练时间已延长为一年六个月。

先到旧市坝的气象科同学不足十人，编在我们机械队上，因人数不足无法开班，这十人中有两人是北平人，看在同乡份上极力说服我转行加入他们。这事我想了很久，无论是机械还是气象，上面都有个「空军」的冠词加在上面，都有违我反对当军人的原则，只是觉得「天

气」这个字，比「机械」的想象空间大多了，机械不管怎么想也离不开飞机，天气则海阔天空，于是答应了他们签字改行。不久，我的两位同乡就发现我是多余的了，因为立即有从南京和汉口两地招来的一百二十多个新生来旧市坝报到，再加上原有的十来人和我，使气象第八期的人数超过一百三十人，成了旧市坝人数最多的一队，我们编入第九队，队部在操场西北角上的一处四合院，和四合院紧邻的是一处低矮的农宅，说不定他们才是原来四合院的主人，他们经营四周的水田栽育水稻，也兼营养猪，也兼卖点四川特产的麦芽糖，芝麻杆儿，我是他们的主顾之一。

所谓的人伍训练，大概自从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以来，大抵均相同吧，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是更为无聊的整理内务，把棉被压成豆腐干模样。这那是想训练勇敢军人？多半是怀着想把我们弄成白痴，好听任他们摆布的鬼胎。因此，我们若用「快跑」方式倒看这一段录像带，则除了几个我被处罚两腿半分弯，并头顶棉被，或被罚俯立挺身二十下几个镜头之外简直没啥可看，倒是两个有关于「吃」的镜头，值得停格下来让你观赏一下。

事情均发生在我们到大足旅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大足的佛像石雕群是仅次于龙门、云岗、和敦煌的中国第四大摩崖石刻，我是名实相符地走马看花。反而是一个中年和尚吃饭的镜头吸引住了我，镜头

为什么至今仍深印在我心上，我也说不上来。我们是单排行军，一面在小路上前进，一面看右手边从大山巨石劈雕而成的站、立、坐、卧等姿态各有不同的佛像，就是在这时候，那个正要吃饭的和尚把我的目光从佛像上吸引到他身上去。

他，那位至今犹未忘记的和尚，他，露天盘坐在小路偏低处一座平坦石头上，他并没有双手合什或祈祷、感谢什么的，他，只是坐在那儿，面前一大碗刚煮成的白米饭，因为旁边只有一小碟红色辣豆瓣为菜，因此显得那碗饭特别的白，看着看着，他就以左手端起了大饭碗，右手用筷子扒一大口入嘴去咀嚼，这才以筷子蘸点辣酱伸入嘴里吸吮，且他根本没有注意甚或感觉出他的上面有一个长长行列的军人，正在经过且在看他。后来许多年，我看了日本铃木大拙写的一系列有关禅的著作，也看了不少我们台湾出版的有关禅宗顿悟的故事，那些得道大师修成正果的过程，全都是心传心，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达的。我正是如此，我无法告诉你那个专心吃饭的和尚，为什么会让我记忆到今天，至于说他让我悟得了什么，似乎更夸张了。总之，我一定痴立了很久，被后面的同学大声提醒，我才，我后面的同学也是，用小跑步跟上了前面的队伍，原来我们已经比人家落后三十公尺远了，想想，人家游了名胜古迹感怀必多，而我只记得一个和尚吃饭，真是俗得可憎。

第二个值得你倒带一看的镜头，也是和吃有点关系，但并不完全是吃。四川省大足县有一位退休的将军，应该是我们教科书上所称的「军阀」，比周效栋的爸爸阶级高了许多，年纪也大了很多。每次有旧市坝的空军入伍生到大足县旅行，一律由他作东请全体同学们到他府上吃饭，吃的是酒席，无酒，但有拚盘，四小炒，四大菜，甜点。吃的当然值得一记，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训话」，队伍排成凹字形，就在他们家的前院天井，足见他的住宅有多大，他，由一位类似于副官的人陪着，均穿便服在我们面对的门前出现，队长大声下口令喊：「立正」，然后用标准的军人动作转身，并向前小跑几步，再立正，行举手礼，等他回礼了，队长才大声说：「恭请司令训话。」

他的训话自然了无新意，无非是中国被列强欺凌了近一百年，未来的发奋图强，便仰仗你们空军了。我后来看了类如「传记文学」那等杂志，知道「军阀」们之中，也有真正爱国，胸襟开阔并以清廉自许。眼前这一位，似乎在下野之前，并没有忘记为自己存足够的金钱，在家乡盖一幢享用终生的大宅院。

吃了人家的饭，但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我们台湾仍有许多在旧市坝受过洗礼的退休空军，或许他们之中有人记得这位将军，三、四年之后大陆就风云变色了，他还能保有他的房产、财产，甚至于身家性命吗？

旧市坝的经验只让我体认到一件事，即，无论何国、何处的军人，无论胸前排满了多少勋章，表面上多么令人敬畏，其实这等人只有一个出身----入伍训练。要先扮演傻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最好是如同没有思想的木偶，踢正步前进时，不能被视为一群人，要如同一排一排的木偶。扮演傻瓜成功了，才配称为一名军人，我很缴幸地也伪装成功。

入伍训练完毕，乘上军用大卡车，由旧市坝上车，路经遂宁县住一夜，再经乐山县，于次日下午到了成都校本部。我们如同一批货物，旧市坝的长官把我们排成凹字形，报数，计量，连同名册一并缴交成都校本部。